



浙西南，这块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留有多处革命遗址，值得重视与挖掘”的红色圣地，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孕育了伟大的浙西南革命精神。以“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为内涵的浙西南革命精神，是1926年冬开始，浙西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9年5月浙西南全境解放，逐渐萌生和形成的，是引领浙西南革命攻坚克难、走向最终胜利的一种革命精神。这一精神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23年艰苦卓绝的浙西南革命斗争淬炼了忠诚使命的思想灵魂

在当时浙西南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各级党组织和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正是在忠诚使命这一理想信念支撑下，不畏强敌、攻坚克难，最终在浙西南站稳了脚跟。

对命令坚决执行。1934年7月5日，红七军团受命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出发，经福建北上。1935年1月底，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遭受国民党军队重创，只有粟裕、刘英率领的先头部队突出重围。在这支部队到达闽浙赣苏区不久，中央即命令以抗日先遣队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挺进浙江，在国民党统治腹地开拓游击新区。接到命令的挺进师500余指战员毫不犹豫，立即誓师出征，并于2月下旬挺进浙江。挺进师对中央命令的坚决执行，是忠诚使命这一革命精神的生动体现。

对使命坚定履行。1930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简称红十三军）在永嘉县成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同年8月30日，红十三军面对训

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历史底蕴

□ 潜春红

练有素、武器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组织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冲过缙云铁索桥，一举攻占缙云县城。这是红十三军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战斗。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专门刊登《浙南红军攻占缙云县城》的专题消息，极大鼓舞了浙西南人民的革命斗志，为后来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开展革命活动打下坚实基础。1935年8月到1937年7月间，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红军挺进师广大指战员始终牢记使命，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面对70倍于己的国民党王牌主力军，挺进师全体将士英勇无畏、奋勇杀敌，粉碎了敌人数次“围剿”，有效牵制和打击了敌人，策应了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正是忠诚使命的责任感，支撑着挺进师全体将士开展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结出了丰硕的胜利之果。

对信仰誓死捍卫。在浙西南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先烈用生命书写忠诚，用鲜血捍卫使命，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树起了一座座丰碑。中共浙西南特委四任书记宗孟平、黄富武、许信焜、张麒麟和副书记杨干凡，都在浙西南革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2年2月8日，浙江省委第一任书记刘英被捕，并于5月18日在永康方岩被敌人杀害。“幼时不知路，今日

上坦途。赤心献革命，决无反顾。”这是刘英在参加革命时写的一首诗。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以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实践了献身革命的铮铮誓言。据不完全统计，在浙西南革命斗争中牺牲的英烈达1500多人，献出生命但无法查证姓名的更是不计其数。斗争的残酷、死亡的威胁更加彰显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对信仰的无限忠诚，他们前仆后继、毅然决然担负起艰巨的任务，用忠诚谱写出一曲曲荡气回肠的革命赞歌。

23年艰苦卓绝的浙西南革命斗争砥砺了求是挺进的行动担当

浙西南革命精神区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特色之处便是求是挺进，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与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所开展的独特作战有关，也与红军挺进师广大指战员身上所体现的独特精神有关。

面对恶劣环境仍然斗志昂扬。浙西南革命斗争环境之恶劣，在全国各地的根据地斗争中都是极为罕见的。一方面是自然环境特别险恶。浙西南处于浙闽赣交界地区，纵横100余公里，这里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地势

险要，自然条件十分艰苦。另一方面是政治环境特别险恶。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是蒋介石的老家，反动势力组织严密，保甲制度遍及乡镇，是国民党着力打造的“模范省”，是敌人重点防范的地区。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肩负使命的红军指战员们没有半点气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始终秉持勇猛前进的挺进姿态，顽强战斗在崇山峻岭之间，硬是在敌人眼皮底下，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失去外部联系依旧独立斗争。求是挺进不单单是指在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挥下奋勇前进，更是指在与外界失去联系、缺少命令指挥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分析研判，积极主动开展斗争。1935年，红军挺进师成立不久，仅有的一部电台在一次战斗中被炸毁。在与中央和上级党组织联系通道被切断、信息闭塞、孤军奋战的情况下，挺进师广大指战员依旧义无反顾挺进浙西南，创建和开辟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蒋介石的后院建起革命堡垒，似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腹。

情况复杂多变尚能创新求变。挺进师挺进浙西南之时，正是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南方游击战争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浙西南的情况尤为复杂严峻。对挺进师而言，大兵团作

战的常规战术已经无法克敌制胜。为此，挺进师以勇于开拓的魄力，及时抛弃惯性思维，积极主动开展分散游击和“敌进我进”的战术，在斗争实践中依靠求是创新的智慧，把游击战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还要求指战员尽快熟悉当地风土人情，争取群众支持。这一系列创新举措的实施，为挺进师的生存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夯实了基础。

23年艰苦卓绝的浙西南革命斗争汇聚了植根人民的力量源泉

正因为汇聚了植根人民的力量，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挺进师才能在浙西南这片大地地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全心全意为了人民赢得群众衷心拥护。山高地贫的浙西南，靠天吃饭的群众本就生活穷困，生计十分艰难，加之国民党横征暴敛，人民的生活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出发，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群众解决生计问题，让饱受苦难的人民群众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加之挺进师

纪律严明，不扰民、不欺民、不压民，始终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很快就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一心一意依靠群众获得群众坚定支持。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充分利用浙西南人民受过红十三军暴动影响、对革命抱有好感的实际，通过各种方法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在思想上充分相信群众，在行动上与群众打成一片、抱成一团，逐渐获得群众理解与支持，越来越多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人民群众将红军、游击队伤病员隐藏在家中或山上，为伤病员烧茶送饭、换药疗伤，为了他们的安全，有的群众甚至献出生命。如缙云县招序村民陈丁兴，知道游击队的隐蔽地点，但当国民党军官用手枪顶住他的头逼他说出游击队下落时，他却一口咬定不知道，直至被枪杀也没有说出游击队的隐蔽地点。

争取群众发动群众积聚革命磅礴力量。为了尽快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挺进师来到浙西南后，创造了许多争取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如粟裕规定挺进师全体指战员每人每天要写五条标语，找十个群众谈话。同时要求凡是部队初到一地，要尽量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在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浙西南群众普遍认识到挺进师是来帮助他们而不是来迫害他们的，于是积极主动为挺进师提供各种帮助，以各种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军民一家亲的生动局面很快就在浙西南形成了。



新时代「四有」军人 文职人员要做

□ 董俊林

文职人员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要坚决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才干，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汗水。要在保障和提升战斗力中起到关键作用，善用科学技术、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等现代战争重要要素的突破来形成更为可靠和强劲的战斗

要有血性的文职人员。习近平主席强调，没有血性的军人不配做军人。有血性，就是要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已经成为革命军人的基本品格。军人都是胸怀家国天下，为着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断地抛头颅、洒热血。加入军营的热血志士们要有着驰骋疆场的豪情壮志，为了国家和人民，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文职人员姓“军”名“文”，内在要求把血性放在文前。英勇顽强，就是要面对困难和危险时，敢于亮剑，不怕牺牲，为了胜利而奋斗。文职人员面对军队安排的诸多工作任务要求，必须要拿出血性来，“余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敢打敢拼，战胜困难和挫折，为军队的建设和战斗力生成夯实根基，成为党和人民信得过的力量。

“有”为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刚加入军营的文职人员，大多是改革开放后出生长大的。生活在较为良好的社会物质环境下，对流血牺牲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还存在思想散漫、娇骄之风等和平积弊。文职人员要在军队的教育和磨炼中祛除身上的懦弱之病，向全军英模人物学习，向身边的优秀军人看齐，加速培养自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和气节。

做有品德的文职人员。人无德则不立，对于军人而言，德的要求更高。有品德，就是要情趣高尚，品行端正。文职人员在经历社会环境耳濡目染、风吹浪打之后，还能否保持情趣高尚和品行端正？面对社会各种诱惑时，能不能坚守一颗当初渴望军营时的纯朴初心？这些都有待于通过考验去揭晓答案。文职人员要做高尚的人，告别和脱离低级趣味。要目标远大，志存高远，追求真善美，拒绝假恶丑。自觉抵制身边的一些不良习气，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品行端正的时代军人。

系好人生的每一粒扣子，才能走得端、行得正。品行端正是每个文职人员必须铭记于心的道德教化。军队是最看重人格品行的地方，能否迅

速地立足和融入军营，品行尤为关键。斤斤计较，争名夺利，不顾集体和他人，是军营工作生活大忌之一。正衣冠、修身性，文职人员要以军队的道德楷模为榜样，以军人的作风要求自己，端正品行，培育出新时代军人的精神风范，做文明之师中的光荣一员。

广大文职人员要树立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迅速融入军营，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四有”军人，培育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把自己最美年华和最具创造的成就留在军营，不辜负时代重托，不辜负人民期望，不辜负国家培养，不辜负青春韶华，为强军兴军事业大展宏图，为国防和军队事业贡献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强军梦持久奋斗。



济南战役：开创大城市攻坚的先河

□ 李久峰

济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全面进入战略进攻，由华东野战军发起的第一次对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攻坚战役。战役从1948年9月16日发起至24日结束，历时8天，全歼守敌10万余人，活捉敌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济南战役的胜利，严重打击了蒋介石依托大城市的重点防御计划，为尔后我军发起淮海战役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还解决了我军如何攻克大城市的现实问题，为解放战争后期的大城市攻坚战提供了宝贵经验。

攻济打援，分工协作。济南是国民党的重要战略要点之一，守敌有王耀武部的3个师9个旅另5个保安旅约10万余人，以商埠、外城和内城构成3道基本防御阵地，形成东、西两个守备区的坚固防御体系。同时，蒋介石还在徐州地区配置3个兵团约17万人，随时可对济南进行支援解围。综合当时情况，华野首长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以少数兵力攻打济南，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通过运动战大量歼灭敌增援兵团。第二，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以部分兵力阻击北援之敌。第三，攻济与打援同时进行，视战场情况发展再有重点地区分兵力。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对华野作战方案反复研究、综合衡量的基础上，确定了“攻济打援，分工协作”的战役指导方针，并着重强调战役的主要目的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部分援敌，但是在战役部署上如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势必因援敌过多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导致攻济不能成功。华野根据这一方针，最终确立了“既攻济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的战役决心，以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以总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阻援打援兵团。实践证明，正是此战役方针和部署使配置在徐州地区的3个兵团始终不敢北上援济，从而确保了我攻济的胜利。

立足险难、充分准备。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给华野回电中指出：“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是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是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

南；三是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在第三种情况出现时，你们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弹药和粮秣上均有办法战胜敌人。”华野根据上述指示，充分细致进行了战役准备。首先是周密制定作战计划，以山东兵团全部加外线兵团一部组成攻城部队，先期攻占济南机场阻敌空援，分割其外固守敌而歼灭之，而后迅速突入纵深攻占其内城及商埠，以便缩短攻城作战时间；打援阻援部队全部置于援敌正面，采取夹运河而设阵的部署，计划阻敌20天以上而后逐机歼灭部分援敌。其次是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此役共动员了50余万支前民工，一万余副担架，组成了12所野战医院，大批粮食、弹药和军需物资都按计划运到战区，有力保障了战役的顺利进行。鲁中南、鲁西南地区的民兵、地方武装，一方面协助部队阻击援敌，一方面收集情报、排查阻击逃窜之敌，配合主力部队行动。同时，为策应华野的攻济作战，中野以一个纵队直接支援华野阻援打援，另以部分兵力向徐州周边要点发起攻击，以此牵制徐州之敌不敢北援。

东西对进、活用战法。灵活运用战法 是济南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华野及山东兵团首长决定采取“四面合围、东西对进、多路突破”的战法，区分东西两个攻城集团，从两面进行钳形攻击。攻城西兵团由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统一指挥。攻城东兵团由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统一指挥。按照作战预案，宋时轮指挥的西线集团为主攻，主攻方向是济南机场，目的是尽快切断济南之敌与徐州的联系，断绝敌唯一赖以空援的通道。聂凤智指挥的东线集团，按照部署担负助攻任务，目的是以猛烈的攻击从东线突破，牵制敌城内预备队，配合攻城西兵团对敌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东西对进、多路突破的攻城战法，使敌难以判明我主攻方向，城内预备队也因此疲于东西两面驰援，使守敌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在夺占商埠、外城、内城3道防御阵地的战斗

中，攻城部队还灵活采取穿插迂回、分割包围、连续突击、胶着歼敌等战术方法，直捣敌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等重要目标，打乱敌防御部署，使其自乱阵脚、慌乱溃败。尤其是在攻克坚固城墙工事时，综合运用炮火直瞄、人工爆破、近迫作业、兵力突击相互协同、集中突破的战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动员激励、攻心瓦解。济南战役之所以取得伟大的胜利，重要原因之一 是战役中实施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华野前委9月1日发出济南战役政治动员令，广泛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并提出“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打下济南城、解放全山东”等口号，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参战军民的战斗热情和必胜信心，对夺取济南战役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攻城作战中，部队边打边动员，边打边鼓动，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饱满的战斗热情。战至23日，九纵73团受命于内城东南角进行攻击，但遭敌残部拼命抵抗，战况异常激烈，虽4次攻击受挫，但仍百折不挠，奋勇突击，打退数倍之敌的拼死反扑，最终登上城头巩固扩大突破口，为后续部队向纵深发展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被授予“济南第一团”的光荣称号。此次战役，我军在加强自身动员教育、宣传鼓动的基础上，还特别重视对敌的政治瓦解工作。战役展开前，华东局、华野领导就决定策动国民党第96军军长兼整编第84师师长吴化文部起义，在其顾虑重重、犹豫不决的情况下，通过强有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心敦促，迫使其率所属的3个旅两万余人向我投诚起义，将济南飞机场及周边防区移交攻城西线兵团，从而减少了我军的战斗伤亡，缩短了解放济南的时间，加快了战役的整体进程。

